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98-0276-2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
—重庆市—1937—1945 IV. D235.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4710 号

书 名: 中 共 中 央 南 方 局 史

编 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吴江 王兵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2mm×230mm 1/16

字 数:434 千字

印 张:28.75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76-2

定 价:56.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总序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于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基础上,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全面领导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其间,南方局实际存在大约八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在这一时期内,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的历史,与此前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之后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及东迁后在重庆建立的四川省委,还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因此,南方局的活动,基本上

涵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的光辉历史和卓著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和合作,与国民党内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战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又配合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参与政协会议和停战整军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前景做出了不懈努力。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根据地;领导粤、滇、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等地武装斗争,使之不断发

展,壮大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领导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开辟工作,掌握部分武装,以应对日军入侵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军事统战,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南方局把以工、农、青、妇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通过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战地服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反汪”运动、宪政运动中动员群众;按照“三勤、三化”要求,深入群众,建立据点,积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在领导胡世合运动中迎来抗战胜利;领导一二一运动,促进政协成功,在和平民主运动高潮中推动进步群众组织的建立;在领导群众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特别是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的组织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稳住了脚,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胡乔木同志曾经

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研工作，并很快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成效。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党委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有余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990年初,完成使命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宣布撤销。

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同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局[2002]97号),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部署开展新一轮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的高度重视。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长沙召开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宋平同志专门发来贺信,鲁明、张颖、成元功等老同志以及相关省区党委负责人应邀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根据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正式成立了以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为顾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负责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建立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设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继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编写,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并决定首先启动丛书专题类第一期六本书稿(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的编写,以最终形成丛书“一主九专”结构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小组会议(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以加强交流、研讨问题、检

验进度、部署任务的工作模式,并以《会议纪要》将相关任务固定下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出重要批示:“就是要通过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自此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由李忠杰副主任负责,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力度,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和组织部署每年的工作任务;有关省区(市)党委及党史部门认真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和重庆会议确立的任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上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切实履行职责,在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档案查阅以及会议组织等方面提供大量服务。2005年11月、2007年6月和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相继在昆明、武汉、重庆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李忠杰每次都亲自出席,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和《丛书》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把关定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检查工作进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每次工作会议主题突出、任务明确,对涉及南方局历史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充分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这些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务实、认真、和谐、高效”的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从而保证了以《丛书》编写为主体的南方局历史研究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坚持这样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作风,南方局的历史资料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保持着“年年有部署、年年有检查、年年有推进”的良好局面。

如何统筹规划丛书编写工作,保证丛书质量,是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一直注意的中心问题。每次工作会议,都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李忠杰副主任在2005年的昆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2007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2008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历次工作会议对这些原则和要求都达成了完全的共识。经过各成员单位近五年的努力,现已编写完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较好地遵循和体

现了这些原则、要求和意见,达到了“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表述准确,文字流畅”的要求。丛书集中反映了十几年来在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比较好地搭建起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现在,这套承载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多年期望,寄托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凝集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们长年心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这套丛书,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为主干,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期专题类六部书稿为支干,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作开展中国共产党专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党史工作者历史责任和攻坚克难敬业精神的凝聚。在此之后,我们还有若干专题书籍需要继续完成并出版,在成果转化上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但这一次这套《丛书》的集中出版,标志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完成了主干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

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全体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党所尽的历史责任,也饱含着我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们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5月

前言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是中共中央建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前哨阵地,肩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协调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责任,是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领导南方各省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堡垒。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党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各级组织,坚定地、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维护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努力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战胜利以后,又为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和党建工作,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局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南方局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研究、撰写南方局的历史,必须站在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高度,把握和审视全局,注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注重历史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

一、要从“十年国民党统治区,三个中央局”的历史长度和宽度去把握南方局的历史

从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到1947年2月国共两党彻底决裂,前

后共约十年。这十年中,国内政治的焦点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为了处理好两党的关系,贯彻执行这一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三个中央局常驻国民党中枢机关所在地,统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论是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还是1939年设立的南方局,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南京局,都是关系全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中央代表机关。

这三个中央局都是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1937年12月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当时武汉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1939年1月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1945年12月暂改名为重庆局),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1946年5月南方局(重庆局)东迁南京,名为中共中央南京局,当时国民党政府已返都南京。三个中央局不仅时间上先后相互衔接,而且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们都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之下,承担着相同的主要任务——维护和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带领所属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它们的工作完全是前后相衔接的。第二,三个中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同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集体,而工作班子的骨干力量也变动不大。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间里,其核心领导人是周恩来。第三,所辖党组织所在地区大体相同,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也包括部分沦陷区。第四,主要活动方式基本相同,即三个中央局均依于八路军办事处或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均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活动,多数工作人员亦以各种合法身份有一定保障,而所属的党组织则完全是处于秘密状态的。

三个中央局一脉相承,但以南方局存在的时间最长,面临的局势和情况最为复杂。本书正是以南方局历史为主,同时也上承长江局下接南京局历史,以求比较完整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进程。

二、要从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认识南方局的历史

根据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高举抗日民主的旗帜,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进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贯穿于南方局历史的一条主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范围广泛、情况复杂、矛盾尖锐,但又在共同抗日的总目标下实行合作的庞大阵营。南方局的中心任务,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依托解放区,立足国民党统治区,与各方力量打交道,致力于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而这个基础却是不坚实稳固的,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一方面,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坚持一党专政,极力在抗战中剪除异己,限制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共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当局既是中共需要联合的主要对象,又是冲突、斗争的主要对手。南方局在与国民党交往中,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始终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帜,把握主要矛盾不转向,对国民党进行团结争取,对其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几度濒于破裂的国共关系得以缓解,避免了全面内战,维系了国共合作,直至抗战胜利。可以说,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这是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主要特点,也是南方局工作的主要业绩所在。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共双方既团结又斗争的焦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武汉沦陷,即中国抗战初期,斗争的焦点,主要是组织千百万群众全面抗战,还是由国民党包办、由政府 and 军队实行片面抗战。在这一阶段中,国民党的限制和压迫,挡不住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但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抗日是积极的,政治上有一些改良。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比较融洽,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这是在南方局成立之前长江局时期的事,但与后来南方局工作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南方局成立之后,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到

1944年春夏国共第四次谈判止,前后近六年时间。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妥协、分裂、倒退。斗争局势时急时缓,总的趋势是矛盾逐步加剧,其间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成为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皖南事变后,两党斗争的激烈程度、力量的消长,以及中间党派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南方局准确地估计形势,创造性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进攻,军事防守”的方针,坚守阵地,力挽狂澜,镇静而细致地开展艰苦的工作,取得国内外广泛同情,击退了这次严重的反共逆流,避免了全面内战,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第三阶段,是从1944年秋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口号到抗战胜利。斗争的焦点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领导抗战到底,还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此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在此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已在各党派各阶层中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广泛开展,各阶层人民积极要求发扬民主,取缔特务统治,废除一党专政,坚持抗战到底。“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加强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力度。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本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时民主运动的开展、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仍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党派的不同态度。

第四阶段,是从抗战胜利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这时中日民族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为代表的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实行和平民主,还是实行内战独裁。

这一期间,国内政治分化非常激烈。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切成果,包括战后的“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均被破坏。至1946年底,国民党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除青年党、民社党和极少数“社会贤达”外,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均拒绝参加,双方营垒已见分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党派各阶层力量广泛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而

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民主运动已发展成为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把蒋介石政权包围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要从贯彻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考察南方局的历史

这个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南方局坚定而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配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实现了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争取了力量,赢得了人心。

争取中间势力是南方局工作的重要内容。当时的中间力量,情况非常复杂。就其大多数而言,大体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的各抗日党派、地方实力派、工商界、文化界、华侨的中上层人士,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等诸多方面,而中间党派则是与各方面有着广泛联系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不断加强对中间党派的工作,对他们的抗日民主要求给予大力支持,并将其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日民主运动,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争取地方实力派,促进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中间力量成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重要制约力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对中间力量领导权的胜利。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革命传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广大知识分子发扬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奔走呼号,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在知识分子中,作为个体,虽有进步、中间、落后之分,但作为一个群体,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抗战时期大后方聚集着中国众多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知识精英,其密度之高,前所未有。南方局理解和重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通过各种渠道

与包括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学技术等各界知识分子和以大中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进步作用。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掀起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的高潮。南方局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组织了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蓄积了大批建设人才。南方局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团结了最大多数的爱国知识分子,增强了他们对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最广大、最基本的依靠力量,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继续发扬这一优势,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势提出任务,引导和主导了群众运动的方向。从抗战初期群众性抗日活动的蓬勃开展,到国民党顽固派加紧限制、迫害进步力量,南方局领导的各单位、学校的“据点”活动,扎实而深入的推进。到抗战后期民主运动发展,各界群众积极参与,尤其是青年学生,积极地走在运动的前列。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过去的比较狭小的天地,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南方局是一扇对外的窗口和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不仅通过民间的渠道,争取了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也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带有官方性质的外交联系,并在一些问题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帮助和支持。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旧政协的召开,当时的美、英、苏等国都起了一定作用。这一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互相配合,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南方局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开拓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从而成为新中国外事和外交工作的先导。

四、要从党的自身建设这个党的生命线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南方局的历史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建设随着抗战形势特

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抗战初期,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的组织空前发展壮大。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反共政策,南方局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既避开锋芒,使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异己的阴谋不能得逞,又顾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和全局,还巩固了党的组织,积蓄了力量。在国民党高压下,南方局保全了各地党组织的主要骨干力量,并将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待到民主运动兴起,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南方局所属各地、各系统党组织立即发挥作用,起来斗争,成为领导民主运动高涨的中坚力量,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极其恶劣艰险的环境中,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焕发了异彩,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正是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民主斗争的实践中,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气节相结合,培育和实践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的不竭动力。